

# 目 录 学 初 解

張 遵 儉

学术界关于目录学的专书和論文已經发表了不少，但是对于目录学的定义却众說紛紜，莫衷一是。更有些著作里列举中外古今若干家关于目录学內容范围的解釋，但没有說出誰是誰非，反令讀者困惑。

中国目录学是从刘向《别录》开始的，其时尚无目录之名。目录的称谓始见于南朝宋丘深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汉郑玄有《三礼目录》，但不能肯定其为目录学著作，故不举。）宋朝人纂《新唐书艺文志》，其乙部有目录类，收书十九家二十二部四百另六卷，是采用目录为类名之始。此后，这个名词由于图书出版数量日多，目录著作日漸繁富，就推广开来了。在我国古代著作中談到目录的时候，有时指的是图书目录，有时指的是目录学。我們切不可以为在清朝乾嘉时期出現“目录学”名词之前，中国无目录学，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十八世紀以后，在朴学家的提倡下，目录学成为显学。王鸣盛以至于說：“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間途，方能得其門而入。”推崇到很高的地位。既然推崇到这么高的地位，則把目录学仅仅看成簿录群书、編定甲乙的事就不行了。它固然有所不同於学术史，但却又必須涉及辨章学术的范围，这里边有很大的學問。俞曲园《札遯序》云：“昔人有謂卢紹弓学士者曰，他人讀書，受书之益；子讀書，則书受子之益。卢为怫然。”这个故事很有趣，朋友恭維卢文弨一翻，他为什么反倒不高兴呢？卢文弨是个学者，把他說成匠人，他当然怫然不悅了。中国目录学者一向认为，是正訛誤，編次簿录，“实胥吏之所优为”，是不足以言学术的。他們从来以条貫学术为己任，他們所从事的不仅是类次群书，校正文字，而主要是通过这些揭示一书的思想內容，以及作者在学术方面的派別与成就，借以启迪后学。因此当我们确定目录学的界义問題时，不仅要考虑到这是一个学术問題，也要考虑到这是一个傳統問題。

根据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发展情况，根据我国目录事业在当前科学研究事业中所应起的作用，根据目录学和其他姊妹学科的关系等方面来考虑，我們

可以初步确定：当代目录学的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鏡源流、推荐好书、指引閱讀”。根据上述任务，当代目录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图书，其次是书刊目录。謹申說如次。

从目录学的博大方面說，它应该以书为綱，約略討論到各书內容梗槩、义理短长及其相互关系；討論各个作家的成就、流派和师授淵源。把这些介紹給讀者，也就是把讀書、治学的門徑指引給讀者。清人金榜所說：“不讀破天下书，不能治《汉书艺文志》；不讀《汉书艺文志》，亦不能讀天下书。”这正是說明治目录学的功夫与目录学的作用。从目录学的精微方面說，它可以研究簿录群书的体例，編次各种出版物目录的准则，与夫著录款目的探討等，以为后学取法，提高目录质量。以上两方面的研討都很必要，但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从屬的；因为目录学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前者方面，目录学研究的思想性和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前者方面。为此我們說，目录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图书，其次是书刊目录。

目录学者是思想工作者。他們辨章学术、考鏡源流的目的是推荐好书、指引閱讀。辨章学术，考鏡源流确实近乎学术史的任务，但是有区别。学术史研究的对象是学科、学派、学者；目录学研究的对象是图书与目录。但在另一方面，书籍是知識的宝庫、学术的总结，所以編纂图书目录不能不涉及书中表現的思想內容和理論要旨，并略具其淵源得失，从而依靠这个指导讀者。目录学者既以推荐好书、批判坏书为己任，那就必須有个原則，这就是党性原則，也就是評介书刊的立場、观点、方法問題。古典目录学家从来就坚持他們正統派的立場、观点，为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服务。《四庫全书总目》的作者写《經部总序》，一开头便說：“經稟圣裁，垂型万世，刪訂之旨，如日中天……”推尊得这么利害，不許誰碰一碰。宋人王柏写了一部《詩疑》，作了点翻案文章，四庫館臣就痛斥他，“柏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孔子哉！”其爱憎十分鮮明。当代目录学著作，必須把評介一家一书之宗趣与指归的工作，和党

通过书刊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及提高学术知识水平的工作任务联系起来，对于好书推荐之，歌颂之；对于坏书揭露之，批判之。在鉴定著者个人及其著作的时候，体现党性原则，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各种图书的思想内容，提出正确评价，用这个来引导读者阅读。唯其如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八个字也就充满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部目录著作，怎样具体地完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呢？张尔田在《汉书艺文志》举例里说：“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緯。”这样看来，有两方面的任务要完成，第一方面是周知一代之学术的任务，第二方面是阐述一家一书之宗趣的任务。在第一方面，依靠目录的类序（包括总序、小序、案语等）去完成它，上举《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总序》，就是一个例子。在第二方面，依靠目录的解题去完成它。解题以书为纲，分别有所詮釋。它包括些什么内容呢？现举一九五五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垣同志编著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为例，我们可以从这部具体的目录著作中得到一些启发，来回答这个问题。此书是专题性书目，与综合性目录不同，它没有类序。它把所收的书按成书的年代先后排列，“每书条举其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板本源流、撰人略例及本书内容体制，并与史学有关诸点。”由此可见，作者每列举一书的书名以后，其解题部份基本上包括：（1）诸家目录所纪载的异名、略名。（2）作者小传（着重在学术思想方面）。（3）历代诸家目录所著录的卷数有何出入，辨别哪是残本，哪是善本等。（4）本书共有多少种版本，各种板本的优劣及其递嬗关系等四个项目。此外，根据各书具体情况，往往着重地把（5）本书之主旨、内容和体制（包括作书的宗趣、作书的体例及篇目，赅括的时代等）。（6）本书之特色（或得失）。（7）本书在学术上的利用（说明后人所写的书中，有哪些是摹倣此书体制的，有哪些是引用了此书中的材料的。也说明本书中有些什么材料，适合作某项科学研究者采用。也说明本书中所论某事某物，与甲书合，与乙书不合，孰是孰非等等。）（8）前人著录订讹等若干部份，单项地提出加以叙述。当代目录学家可以研究上举陈氏书目的体例，融会贯通，在繁简去取之际，斟酌加以采择，开创更适合于编制现藏图书的学术性目录的新形式。

在体制方面，我国目录学著作，一般有三个组成部分：（1）类序，（2）款目，（3）解题。有些书三部份具备，如《四库全书总目》。也有略去类序而保留款目与解题的，如上举陈氏书目。又有仅仅保存款目，其他均付阙如的，这就真正成了一本“流水帐簿”了。历朝史志多如此。《四库全书总目》里，关于《崇文总目》的一段提要，谈到这个问题：“《崇文总目》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晁氏陈氏二目，诸家借为考证之资。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及此书，则若存若亡，几于湮灭，是亦有说无说之明证矣。”四库馆臣主张保留解题，是可以理解的。这段提要也说明了解题的作用。但是说郑樵完全抹杀解题，就不对了。郑樵《通志·校仇略》有《泛释无义论》，说得很明白，他所反对的是《崇文总目》于“每书之下，必著说焉。”他主张书有不应释的，或无须释的，就不释（缺其解题）。有应释的，就必须释（有解题）。这种态度是公正的，科学的，降及今日，我们仍然支持郑樵这种态度。当代目录学家为了提高目录质量，编辑学术性目录时一定要有所释，要有所诠释，但不必每书都做解题，并且必须适应情况有繁有简。像《四库提要》那样，追求形式，徒为辞费，重蹈郑氏“泛释无义”之辙，今日仍须反对。

#### 宋朝藏书家朱昂和他的万卷阁 张了且

距今九百六十年前，七十七岁的朱昂退休后，为保存一生亲手抄写的万卷图书，在荆州江陵县城东建筑了一座万卷阁，还著了《资理论》等书。

朱昂字举之，生于924年，死于1007年。青年时代就努力读了很多书，人称为“小万卷”；壮年在衡州，学问为李昉所赏识；晚年直秘阁，编次过三馆、秘阁的图书。一生好读书、好买书，把所得薪俸的三分之一用在购书上。从数量上说，残唐五代战乱后，宋太祖、太宗、真宗千方百计进行搜集，才有图书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而在真宗初昂所抄的就占国藏四分之一强，后于他的名家司马光只聚了五千卷，欧阳修所藏也才等于他。

朱昂一生淡于荣利，对十五年不升官毫不在意，清风亮节，在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是顶呱呱的人物，只是万卷阁的遗址现在已不存在了！